

第三十章 亨利八世（四）

关于国王婚姻的顾虑——国王顾虑重重——安妮·博林——亨利向教皇申请离婚——教皇有意促成——皇帝胁迫教皇——教皇首鼠两端——跟罗马争议的原因——沃尔西倒台——英格兰宗教改革发轫——外务——沃尔西之死——召开国会——宗教改革进展——召开国会——国王最终跟罗马决裂——召开国会

宗教改革前，虽然教皇的权威受到恭顺的遵奉，但亨利和兄长遗孀、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还是几经踟蹰和困难，才得以通过。国民的偏见，使其普遍反对这样近距离的亲属通婚。先王虽然决定为年仅十二岁的王子订婚，但明显有意等待以后的有利机会再废除婚约。^①他命令年轻的王子一到法定年龄，就宣言反对这次婚姻。^②亨利七世在临终病床上遗命王子不要完婚。这次婚姻太反常，面临无法克服的反对声。国王继位后，枢密院的某些成员，特别是沃汉姆大主教公开反对完婚。虽然亨利年轻、挥霍，有一段时间没有考虑他采取的举措，但一起偶然事件充分唤醒了他的注意力，提醒他认识到臣民普遍的感情。卡斯提尔国会反对查理皇帝迎娶亨

① Morison's Apomaxis, p. 13.

② Morison, p. 13. Heylin's Queen Mary, p. 2.

利的女儿玛丽；除了其他理由外，他们还坚持年轻的公主是私生女。^① 后来，亨利跟法兰西谈判，提议将玛丽许配给弗朗西斯和奥尔良公爵；法国大使塔贝主教重提同样的反对意见。^② 这些事件自然唤起了亨利心中的疑虑，再加上同时产生的其他理由，他越来越懊悔，良心更加受触动。

王后至少比国王大六岁。她的美貌已经褪色，再加上身体虚弱多病，虽然人品、举止无可挑剔，但国王仍然无法接受她。她为亨利生了几个孩子，但大多数死于襁褓，只剩下一个女儿。亨利更多地受到这个不幸的打击，因为摩西律诅咒娶兄长遗孀的人断子绝孙是颇有威胁性的。只要亨利婚姻的合法性成问题，人人都会考虑到王位继承权的问题。人们担心：由于玛丽的合法性有争议，再加上性别的弱点；第二继承人苏格兰国王可能觊觎王位，将王国投入混乱之中。最近的内战和动乱之祸源于继承权争议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使国民普遍渴望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这样的灾难。由此，国王为私人感情和公共利益考虑，想要摆脱噩运。也就是说，摆脱凯瑟琳不合法的婚姻。

亨利后来断言：他的顾虑完全来自于个人反思。他请教忏悔师林肯主教，发现这位长老怀有同样的疑虑和困惑。国王自己就是伟大的决疑者和神学家，随后就运用自己的学识来更加仔细地检查这个问题。他诉诸托马斯·阿奎那的权威。这位著名的博士在教会中享有巨大的权威，国王对他绝对遵奉。在这种案例中，托马斯·阿奎那明确地反对这种婚姻的

① Lord Herbert, Fiddes's life of Wolsey.

② Rymer, vol. xiv. 192, 203. Heylin, p. 3.

合法性。^① 托马斯说：《利未记》和其他经文中包含有不得娶兄长遗孀的禁令，这是永恒的道德教谕，以神的制裁为基础。虽然教皇有权豁免教会法规，但更低级的权威不可能撤销神的律法。国王接下来询问坎特伯雷大主教，要求大主教咨询其同僚。英格兰所有的高级教会长老一致签名盖章，宣布国王的婚姻不合法，只有罗切斯特主教费希尔例外。^② 沃尔西也强化了国王的疑虑，^③ 部分为了促成亨利跟凯瑟琳的侄子查理皇帝彻底决裂，部分为了促成亨利跟弗朗西斯的妹妹阿伦贡公爵夫人联姻，使两国联盟更加紧密；或许也多多少少因为王后不顾他的品格地位，直言不讳地责难他，因此厌恶她本人。^④ 虽然有权有势的宠臣一开始不过是做此暗示，但亨利在更强有力的动机驱使下，决定一不做二不休。

安妮·博林最近才跻身宫廷，有幸出任王后的女侍，经常有机会跟亨利见面、交谈，完全支配了他的感情。这位年轻女士以其荣显和噩运而闻名。她父亲托马斯·博林爵士几度为国王效力，跟王国所有大贵族都有亲戚关系。安妮的母亲博林夫人是诺福克公爵的女儿。托马斯·博林爵士本人的母亲是奥蒙德伯爵的女儿，祖父是伦敦市长戈弗雷·博林爵士。戈弗雷·博林爵士的妻子是黑斯廷斯勋爵的女儿和共同继承人。^⑤ 国王的妹妹嫁给了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，虽然安妮当时还小，但仍然随公主前往巴黎。路易十二去世后，寡

① Burnet, Fiddes.

② Burnet, vol. i. p. 38. Stowe, p. 548.

③ Le Grand, vol. iii, p. 46, 166, 168. Saunders. Heylin, p. 4.

④ Burnet, vol. i. p. 38. Strype, vol. i. p. 88.

⑤ Camden's preface to the life of Elizabeth Burnet, vol. i. p. 44.

后返回英格兰。少女安妮多才多艺，广受称道，留下来侍奉弗朗西斯国王的王后克洛德。王后去世后，安妮转到德操出众的阿伦贡公爵夫人家中。如果亨利后来的自述可信，她返回英格兰的确切时间却不为人知，但迟于国王开始怀疑他跟凯瑟琳婚姻合法性的时候。亨利出于疑虑，已经中断了他跟王后的一切夫妻关系；但他仍然维持礼仪和友谊，经常登门拜访王后。在拜访中，他注意到安妮年轻、美丽、迷人。亨利发现她多才多艺，慧质绝不逊于美貌，甚至策划让她登上王后的位置。国王发现安妮的品德和谦逊使他不可能以其他途径满足欲望，就更加坚定了这个决心。于是，国王的一切动机、倾向和政策都要求他跟凯瑟琳离婚。他预期成功在望，便派秘书奈特出使罗马，向克莱蒙特教皇申请离婚。

亨利无意动摇教宗狂妄的僭越，不打算对教皇特许近亲通婚的权力提出任何一般性的质疑，仅仅坚持撤销尤利乌斯教皇特许亨利和凯瑟琳通婚的法旨。罗马教廷的准则是：如果教皇做出措手不及的让步，或是根据虚假的建议滥予特许，他的法旨可能在以后撤销。教皇经常以此为借口，撤销前任教皇的法旨。而尤利乌斯教皇的法旨一经检查，就发现充满了这些问题。任何有利于亨利的裁决都不愁缺少似是而非的借口，因此可以满足他的离婚申请。法旨一开头就说：教宗根据亨利的恳请下旨。然而众所周知，亨利当时还不到十二岁。法旨还确定了另一个动机：为了保证两王国和平，联姻必不可少。然而可以肯定，当时两王国没有任何争执的理由或争执的迹象。由于尤利乌斯法旨的前提不实，克莱蒙特有充分理由或借口予以撤销，便准许亨利第二次结婚。

虽然滥予特许的借口不太有说服力，但教皇的处境要求他竭尽全力讨好英格兰君主。他当时被皇帝俘虏，没有任何希望以合理条件恢复自由。他唯一的机会有于亨利、弗朗西斯和意大利各邦反对查理野心的联盟。因此，英国国王的秘书私下提出请求时，教皇作出了有利的答复，承诺立刻解除国王的婚姻。^①不久后，劳特累克统率法军进入意大利，迫使皇帝一派恢复教皇的自由。教皇退往奥维莱托，秘书奈特和驻罗马使节格里高利·卡法里重新向他提出申请。他们发现教皇对国王仍然充满友谊、感激和依恋，但并没有马上让他们如愿以偿。皇帝已经获悉亨利的申请，取得教皇的承诺：教皇跟帝国大臣磋商前，不采取进一步举措。这个承诺让克莱蒙特左右为难，他畏惧皇帝在意大利的强大力量，似乎有意拖延亨利的要求。然而，英国大臣再三提出要求。克莱蒙特终于委任教皇特使沃尔西，协同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其他英国教会长老，着手核查国王婚姻和尤利乌斯豁免的可靠性。^②他也临时豁免了国王跟其他人的婚姻，承诺下达教谕撤销国王跟凯瑟琳的婚姻。不过，克莱蒙特告诉英国大臣：如果皇帝获悉这些让步，他随后就会面临危险的后果。他要求英国大臣发誓：在他的自由的独立获得充分保证前，不得公开这些文件，或是进一步利用它们。他秘密建议：只要公开的时机一到，他们应该排除一切反对即刻制造既成事实，宣布亨利跟凯瑟琳的婚姻无效，立刻跟其他人结婚。否则，他以前已经同意国王的婚姻，且以教皇权威确认婚姻有效，这样就

① Burnet, vol. i. p. 47.

② Rymer, vol. xiv. 237.

很难批准这些议程。^①

亨利的大使给他带回教皇的委托和豁免，说明了教皇的建议。国王向大臣开诚布公，询问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如此微妙的形势。英国顾问考虑到当前事项的危险性——如果教皇拒绝批准契约，就有充分的理由称之为措手不及的让步和不合乎正当程序，否认自己私下提供的建议。于是，国王的第二次婚姻就完全无效；第二次婚姻可能带来的子嗣就会宣布为私生子；他跟凯瑟琳的婚姻可能比以往更加坚固。^②亨利考虑到教皇的为人和处境，更担心这种情况可能发生，甚至事所必至。

克莱蒙特极其怯懦，这妨碍他充分发挥天赋和洞察力，否则他的判断力就会极其卓越。^③他结盟反对查理，导致了被俘和其他不幸。此后，他再也没有积极推行任何公共举措。如果皇帝的利益或倾向与之对立，则尤其如此。当时，意大利驻有强大的帝国军队，随时可能回师攻击罗马。罗马仍然毫无防备，同样的灾难完全可能重演。除了这些危险以外，克莱蒙特想象着自己的人身和尊严仍然面临着直接威胁。

查理了解圣父的怯懦性格，便不断威胁召开公民会议。他表示有必要改革教会，纠正广泛存在的弊端。由于罗马教廷的野心和贪婪，教会所有机构无不百弊丛生。他说：有必要限制教皇本人的权力。他带头大声疾呼，要求改良，甚至连他自己的帝位也有质疑的充分理由。人们一直认为克莱蒙

① Collier, from Cott. Lib. Vitel. B. 10.

② Burnet, vol. 1. p. 51.

③ Father Paul, lib. i. Guicciardini.

特教皇是朱利安·德·美第奇的私生子，美第奇是统治佛罗伦萨的家族。虽然他的亲戚利奥教皇根据伪造的婚约，宣称克莱蒙特是他父母合法婚姻的儿子；但这个宣言没有正当依据或权威，没有多少人相信。^① 确实，私生子荣升教皇尊位，使得教规形同虚设。但人们抱有强烈的先入之见：出身有污点的人不应担任圣职。另一方面，教规明文规定：犯下买卖圣职罪的人不得担任圣职。尤利乌斯二世严旨宣布：即使红衣主教事后同意，贿选圣职永远不能合法化，从而增加了新的制裁。不幸的克莱蒙特向科隆纳红衣主教行贿，包括承诺：他一旦在科隆纳红衣主教的支持下当选教皇，就以提拔为回报。科隆纳现在完全依附于皇帝，因此时刻威胁要公之于众。^②

查理一面用这些手段恐吓教皇，一面用希望诱惑他。在他的感情中，希望占据的分量并不比恐惧小。皇帝的军队洗劫罗马、俘虏教皇时，佛罗伦萨人热爱古老的自由，利用他的噩运，发动了反对美第奇家族的叛乱。他们彻底推翻了这个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，重建了民主。佛罗伦萨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由，跟法兰西、英格兰、威尼斯结成同盟，反对皇帝。克莱蒙特从自己的利益考虑，发现他的盟友已经负有义务，不能帮助他复辟美第奇家族；而他对家族复辟事务最为热衷，远远超过其他事务。他知道：只有皇帝才能实现他的目的。因此，无论他如何表白对盟友的忠诚，只要瞥

① Father Paul, lib. i.

② Ibid.

见丝毫跟皇帝能真正和解的希望，他就会接受任何提议。^①

英格兰方面完全清楚教皇的想法和利益。他们预见到：查理皇帝为姑母凯瑟琳的荣誉和利益考虑、为扰乱敌人考虑，都会反对亨利离婚。克莱蒙特为人一向口是心非，目前几乎处于身不由己的境地。在后果如此严重的大事中，他们不能冒险指望教皇以后的支持。最安全的举措似乎是：尽可能地坚持推进原有的盟约，使教皇无法回头；利用他目前暧昧不清的处境，谋取尽可能多的让步。为此，红衣主教的秘书斯蒂芬·加德纳、国王的施赈官理查德·福克斯奉命前往罗马，请求教皇的委任；无论委任人员的裁决是什么，都要求教皇予以确认；无论如何不让他撤回委任，诉诸罗马教廷的理由。^②

不过，国王如此渴望得到这项让步的原因，恰好就是教皇决定拒绝这项让步的原因。他仍然决定随时跟皇帝达成协议，为此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所有其他考虑。他认为：为自己的安全、为他的伟大家族着想，跟皇帝谈判最为重要、最为必要。因此，教皇新委任康培吉奥红衣主教，协助沃尔西裁决亨利的婚姻问题。然而，英国大使不可能说服他插入他们希望的条款。他虽然交给加德纳一封信，保证不会撤销当前的委任，但审视这个承诺，就会发现措辞如此模棱两可，以至于教皇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撤销原议。^③

康培吉奥欠了国王不少人情，但他更多地依赖教皇。因

① Father Paul.

② Lord Herbert. Burnet, vol. i. p. 29. in the collect. Le Grand, vol. iii. p. 28. Strype, vol. i. p. 93. with App. No 23, 24, &c.

③ Lord Herbert, p. 221. Burnet, p. 59.

此，他完全遵奉教皇的意旨。他虽然四月份就接到委任，却找到许多借口迟迟其行，以至于十月份还没有抵达英格兰。他的第一步举措就是劝诱国王放弃离婚，他发现这个建议冒犯了国王，就宣称他的意图也是劝诱王后发愿出家、然后友好地解决一切分歧。^①他主要是为了安抚国王和沃尔西红衣主教，表示教皇解除了亨利和凯瑟琳以前的婚姻。但无论如何劝说，他都不肯让国王的其他枢密大臣参与机密。^②他多多少少为了补赎顽固的态度，向国王和沃尔西红衣主教表示：教皇非常乐于满足他们的一切合理要求。他尤其表示：圣父已经同意他们解散更多的修道院，改为大教堂和主教教区。^③

由于教皇及其使节的举措模棱两可，英格兰宫廷因此举棋不定，决定让国王耐心等待这个迟疑不决的委员会作出决定。在此期间，他似乎交上好运，可望更加确定、更加便利地摆脱当前的困境。克莱蒙特教皇突患急症，各位红衣主教为争取继任而钩心斗角。沃尔西受到英法两国支持，有望登上圣彼得的法座。^④看起来，只要教皇出缺，沃尔西就大有机会实现最大的野心。教皇的病情虽然几度反复，但还是痊愈了。迄今为止，他一直以虚伪和欺诈的手段来对付英格兰宫廷，现在又开始如法炮制。他继续向亨利表示出最热忱的依恋，承诺迅速而有力地解决他的问题。他继续跟查理秘密谈判，一如既往地为了光大自己的家族，甘愿牺牲一切承诺，以及罗马教会的一切利益。康培吉奥充分领会他的意图和看

① Herbert, p. 225.

② Burnet, p. 58.

③ Rymer, vol. xiv. p. 270. Strype, vol. i. p. 110, 111. Append. No. 28.

④ Burnet, vol. i. p. 63.

法，便施展最巧妙的拖延手段，给克莱蒙特充分的时间跟皇帝协商条约的所有各款。

皇帝明白国王对此事非常认真，便下定决心：亨利只能向他请求，以抛弃弗朗西斯为条件，才能离婚成功。迄今为止，亨利仍然支持风雨飘摇的法兰西君主国，反对西班牙的优势力量。因此，查理乐于倾听姑母凯瑟琳的诉求，承诺尽一切力量保护她，劝告她不要向敌人的恶意和迫害屈服。王后天性刚毅果决，自认为蒙受不公、具备一切不断抗争的动机。人们非难她跟亨利的婚姻是近亲通奸，使她怒不可遏。她有最正当的关注理由：她的女儿似乎必然因此沦为私生女。她有极其自然的理由，因此很难听任情敌抢占国王的感情。王后出于所有这些考虑，不断向侄子求助，诚挚地向罗马申诉。她认为，只有罗马才能还她公道。皇帝跟教皇交涉后，都坚持以下基本条款：撤销康培吉奥和沃尔西在英格兰的委任。^①

在此期间，两位特使在伦敦开庭，传国王和王后出庭。国王回应了他受到的询问；但王后没有回答法官，而是起身跪倒在国王脚下凄然陈情。她的美德、高贵地位 and 不幸遭遇使陈情变得更加动人。王后对国王说：她是他领土上的异乡人，遭遇敌人施加的种种不义而无人保护、无人咨询、无人援手。她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祖国，国王及其家庭就是她唯一的亲人。她在一切不幸中都指望、依靠他们的保护，从未想过还会受到他们的欺凌与迫害。她嫁给国王二十年，千依百

^① Herbert, p. 225. Burnet, vol. i. p. 69.

顺、体贴备至，理应受到更好的对待，不应多年以后受到他如此严重的侮辱。她知道——国王本人可以作证——在他们的新婚之夜，她的贞操仍然白璧无瑕；她跟他哥哥的婚姻仅仅限于仪式。时人公认他们两人的父母、西班牙国王和英格兰国王是当时最明智的君主。他们议婚时一定咨询过最好的顾问，而现在这次婚姻却被视为违反自然的罪行。因此这个法庭明显受她的敌人的操纵；她仅仅是默许他们的审判，而不会将自己的理据委托给他们裁决，甚至丝毫不会指望他们会作出公正无偏的裁决。^① 王后说完这一席话，起身向国王深鞠一躬，再也没有在法庭上露面。

王后走后，国王承认：她确实一直严守妇道、有情有义，一举一动无不符合正直和荣誉的最严格法则。他仅仅坚持自己对婚姻合法性的怀疑。他解释这些怀疑如何产生、发展和确定，使他长期遭受强烈的困扰。他声明：沃尔西红衣主教从来没有鼓励过他的疑虑。因此他请求法庭作出支持他的判决。

特使们再次传唤王后。他们宣布：虽然她向罗马申诉，但仍然犯有抗拒法庭罪。然后，他们继续审判。他们首先核查阿瑟王子跟凯瑟琳完婚的证据。必须承认：时隔多年以后，不大可能指望能增加更强有力的证据。王子年过十五，身强力壮；夫妇同居日久，多次有那方面的表示。一切环境证据都非常有利于国王的要求。^② 兄长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亨利没有获得威尔士亲王封号，因为凯瑟琳可能会怀孕。西

① Burnet, vol. i. p. 73. Hall. Stowe, p. 543.

② Herbert.

班牙大使为了更好地保障她的寡妇遗产，给西班牙送去了完婚的证据。^① 尤利乌斯教皇的法旨推定：阿瑟王子或许已经跟凯瑟琳圆房。在亨利缔结婚约的条约中，双方都认为阿瑟王子的上一次婚姻已经圆房。法庭面对所有这些细节，以及讨论教皇权威范围的许多理论，还有反对教皇有权豁免近亲通婚的种种理论。康培吉奥很不耐烦地听取这些学说，他虽然决定拖延审判，但是当国王的枢密院坚持这些不愉快话题时，还是忍不住经常打断他们，要求他们闭嘴。审判勉强拖到7月23日，康培吉奥是主要的审判者。沃尔西虽然担任红衣主教的资格更老，但还是听任他主持审判，因为人们认为：审判由意大利红衣主教主持，比国王自己的大臣和宠臣主持更具有公正无偏的外表。这时，事情似乎就要告一段落；国王每天都在期待对他有利的判决。康培吉奥毫无预兆，因为微不足道的借口而^②突然宣布休庭到十月。国王因此大吃一惊。几天后，罗马下令召回特使，国王长期热切的期待至此完全落空。^③

教皇特使在伦敦开庭期间，皇帝派大臣严肃地敦促克莱蒙特教皇下达召回令，对教皇的野心和怯懦恩威并施。另一方面，英法两国大使齐心协力，同样热忱地敦促教皇特使尽快判决。他们虽然同样恩威并施，却没有掌握皇帝近在咫尺、迫在眉睫的手段。克莱蒙特关心个人安危，渴望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，甚于担心丧失英格兰，从而大大加强路德

① Burnet, vol. ii. p. 35.

② Burnet, vol. i. p. 76, 77.

③ Herbert, p. 254.

派的实力。因此，他一旦跟皇帝谈妥了所有条件，就抓住法庭必需的借口，宣布：鉴于王后的申诉，暂停特使的委任，推迟审判，由他在罗马亲自主持。此前，坎帕拉已经秘密传旨给康培吉奥，烧毁了委任特使的教諭。

沃尔西早已预见到：这样的举措是他身败名裂的先声。虽然他一开始就希望国王娶一位法国公主，而不要娶安妮·博林，但他仍然尽心竭力，争取圆满的结局。^① 失败的原因是克莱蒙特的偏袒，他不应该为此负责。但他充分了解亨利火热、狂躁的性格。国王容不得任何障碍，会责成大臣为他们经手的事务负责，而且既不经调查也不分情况。安妮·博林同样对他有偏见，把希望破灭归咎于他。她为了维持体面的缘故，在教皇特使开庭期间回避宫廷；现在她重新回到宫廷，对亨利的影晌自然更大。安妮·博林大力加深国王对红衣主教的偏见。^② 甚至王后及其党羽根据沃尔西公开的作为来判断他，也对他极为敌视。现在，最敌对的党派似乎在齐心协力毁灭傲慢的大臣。亨利以前对红衣主教的能力评价甚高，但这加速了他的垮台。他认为大臣没有成功，不是因为厄运或错误，而是因为他心怀恶意、背信弃义。不过，打击并没有立刻落到他头上。国王大概是找不到正当理由来疏远旧日的宠臣，似乎仍然犹豫了一段时间。他对待沃尔西，即使没有过去的无限宠爱，至少还有表面上的信任和尊重。

然而，普遍的经验表明：最高的信任与宠爱一旦削弱，就会沦为完全的冷漠，甚至极端的仇恨，鲜有例外。国王现

① Collier, vol. ii. p. 45. Burnet, vol. i. p. 53.

② Cavendish, p. 40.

在决心毁灭红衣主教，就像以前决心提拔他一样突然。诺福克公爵和萨福克公爵奉命索还御玺。沃尔西没有获得更明确的旨意，十分踟躇，不肯交出御玺。^①亨利让托马斯·莫尔爵士送信给他，他才屈服。托马斯·莫尔不仅文采绝世，还具有第一流的美德、正直和能力。

沃尔西奉命离开他在伦敦建起的约克宅第。虽然宅第其实属于约克教区，亨利却将它据为己有。以后，宅第变成了英格兰国王的行宫，号称白厅。沃尔西所有的家具和餐具也被没收，这些富丽堂皇的陈设更适合王室而非私人。宅第墙壁覆盖金银织锦。他有一柜子贵重的金质餐具。他的家里发现了几千匹上等亚麻布。其余的财富与陈设与此相仿。沃尔西之所以受到激烈迫害，他的财富可能是不小的诱因。

红衣主教奉命退隐到汉普顿宫附近的埃塞尔乡村宅第。世人在他飞黄腾达时卑躬屈膝地逢迎他，在他时乖命蹇之际却完全抛弃了他。他自己因时运的转变而灰心丧气、心境大变，过去热衷于虚荣的炫耀、逆境则表现为双倍的严苛。^②重新得宠的最细微表现都会使他欣喜若狂、不顾体面。有一段时间，国王似乎有意放松使他措手不及的打击——他施与保护，把约克和威斯敏斯特教区留给沃尔西；他甚至送去亲切的口信，附带一枚戒指作为友善的证物。口信送到时，沃尔西正在马上。他立刻飞身下马，跪倒在泥泞中，毕恭毕敬地接受君主亲切的信物。^③

① Cavendish, p. 41.

② Strype, vol. i. p. 114, 115. App. No 31, &c.

③ Stowe, p. 547.

但他的敌人害怕他重返宫廷，不断向国王报告他的几次小过失。安妮·博林的舅父诺福克公爵尤其竭尽全力，剥夺了他官复原职的一切希望。因此，他解雇了大批仆从。因为他是个慷慨慈悲的主人，主仆双方分手时都热泪盈眶。^① 国王几次产生一念之仁，现在似乎已经对旧日的宠臣完全硬下了心肠。他将沃尔西交付星室法庭受审、定罪。国王意犹未尽，又将沃尔西抛弃给国会处置。这时，国会经长期中断后再度召集。上议院指控沃尔西，罪名长达四十四款，同时请求国王剥夺其所有职位，严加制裁。上议院的指控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反对。任何部分的罪名都不需要多少证据，因为指控主要是一般性罪名，几乎不可能没有。弹劾提交给下议院，托马斯·克伦威尔为不幸的恩主辩护。他以前是红衣主教的仆人，受知于寒微之中。克伦威尔慷慨、勇敢的精神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，国王日后的恩宠肇基于此。

沃尔西的敌人发现：红衣主教的清白或谨慎使他们的控告缺乏坚实的基础。他们只能乞灵于非常措施。通称的《临时条例》（the statute of provisors）指控他违背了理查德二世的法案，谋求罗马教廷的法旨，特别是教皇特使的广泛权力。沃尔西承认确有其事，申诉他不知道这个法案，恳请国王开恩。起诉或许于法有据，但法案久已废用。多年来，红衣主教的做法有国王的认可和嘉许、有国会和王国的默许，却竟然引为罪名，可见苛酷莫此为甚。沃尔西一直宣称：他获得了最正式的王室特许状。^② 我们对此没有多少怀疑。如果他

① Cavendish. Stowe, p. 549.

② Cavendish, p. 72.

不是明知本案牵涉亨利目无法纪的敌意，本来可能要求在法官面前自我辩护。然而，判决是彻头彻尾地对他不利：“剥夺国王的保护；没收土地和动产；人身准予监禁。”不过，沃尔西的指控到此为止。亨利甚至赦免了他所有的罪名，发还部分餐具和家具，时时施恩垂怜。

英格兰人不满教会的滥权，古已有之。大多数欧洲邦国同样如此。这种主张现已充斥欧洲全境，为路德派教义所驱除，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畏惧异端和革新的观念。下议院对此颇有赞成之意，通过了几项法案来限制神职人员的征敛。一项法案规范葬礼法事；另一项禁止在查验遗嘱时征税的陋规；第三项法案禁止神职人员不在教区或领有多个教区，禁止神职人员占有农场土地。但教会面临的主要威胁显然是：下议院恣意抨击神职人员的放荡生活、野心、贪婪和他们对信徒永无止境的苛索。赫伯特勋爵手中保存了一位格雷院绅士的讲演，提供了难得的史料，我们几乎没有料到这个时代会有这样的论证。议员强调：不同邦国、不同时代的主流神学观点千差万别；各教派争议纠葛，永无止境；从来没有人，更不用说民众能理解，更不用说能验证所有教派的教义和教条；无知不可避免，理应搁置所有这些争论对象。总而言之，他推断：人类唯一的宗教义务就是信仰至高无上的存在，自然的创造者；为了赢得它的青睐和保护，必须遵奉良好的道德。即使在我们的时代，在公共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表达这种态度，也不会受到欢迎，因此接受范围一定非常有限。虽然最初的宗教纠纷会促使天性爱好学术的少数人倾向怀疑主义，但民众不久就委身于几个教派，并在很长时间内排除了所有

这种可憎的自由。

规范神职人员的法案在上议院遇到了一些反对意见。费舍尔主教尤其将下议院的这些举措归因于缺乏信仰，异端和路德教义有计划地掠夺了教会的祖传遗产，颠覆了国民的宗教信仰。诺福克公爵责难这位教会长老，疾言厉色，甚至大放厥词。他对主教说：最伟大的录事不见得总是最明智的人。但费舍尔回答：据他记忆，在他的时代，没有任何傻瓜能成为最伟大的录事。罗切斯特主教的开脱之词不限于此。下议院通过发言人托马斯·奥德利爵士向国王抱怨他们受到的非难。主教只得改善他的措辞。^①

亨利并非不乐意让罗马教廷和神职人员认清形势：他们完全依赖于国王和他的国会。只要国王支持国会的倾向，教会的权力和特权就会灰飞烟灭。下议院在另一个关键时刻满足了国王的希望：免除了他自本朝初年以来的所有债务。他们虽然怨声载道，但还是批准了这项法案，借口国王忧劳国事无微不至，一切贷款都用于了公共事务。国王的大部分债主是红衣主教的朋友，在恩主的敦促下为满足亨利的需要而捐输；目前的廷臣很乐意勒索他们。^② 这种不合法、不经国会通过的征敛方法早已信用扫地，若干廷臣还希望这种权宜之计一直沿用下去。

目前，国王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英格兰国内事务，对外事务无非从属于内政。他已经向皇帝宣战，但英格兰和尼德兰通商对双方都有利，因此他规定对这些省份保持中立。他

① Parliamentary History, vol. iii. p. 59. Burnet, vol. ii. p. 82.

② Burnet, vol. ii. p. 83.